

佟屏亚 / 著

逆向思辨

点击 中国农业科学



贵州科技出版社

佟屏亚 / 著

逆向思辨

点击 中国农业科学



贵州科技出版社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科学研究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深层次问题。作者逆向思辨,对农业科研领域发生的大事要事进行反思,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农业“大跃进”运动以及沉浸在激昂、亢奋、浮夸、跃进氛围中的农业科研导向和“赶超”思维;对农业科研方向、管理机制、职称评定、成果奖励、体制改革,以及存在的科学不端行为、等级制度进行深入剖析。中国农业科学要提倡自由评论,集思广益,科研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才能迈步金光大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向思辨:点击中国农业科学/佟屏亚著.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2009.6

ISBN 978 - 7 - 80662 - 785 - 3

I. 逆… II. 佟 III. 农业科学—科学研究—概况—中国—1949~2009 IV. S-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5043 号

贵州科技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787 mm × 1092 mm 1/16 16.5 印张 245 千字

定价:40.00 元

特 别 致 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庄巧生先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舜阶先生审阅初稿,并对调整全书章节、内容和观点提出宝贵建议。

历史让后人评说(代序)

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经历了 60 个年头,不管是在政治运动连绵的年代,还是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年份,大家都非常习惯聆听这样的报道: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农业生产获得了连年丰收,每年都有许多发明创造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事实,没有人去怀疑。

但是,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逆向思维。如果说过去的头三十年没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农业“大跃进”以及延续不断的浮夸风,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呢?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否认这个推论。可能有人早就这么想了,只是不愿意这么说。历史的坎坷际遇让农业科研人员不堪回首,欲说当年好困惑。

老一代农业科学家,抱负拳拳赤子之心报效祖国,迎接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兢兢业业地做事,谨小慎微地说话,历史无情地浪费了一代人。建国初期培养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业科研人员,扬弃西方科学,有意无意间轻视基础理论,从事科研工作深感底蕴不足,力不从心,历史无心地耽误了一代新人。经历了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文化大革命”,科学研究停顿,农业院校关门,当社会经济要全面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农业科研人员严重“断层”,历史又无奈地断送了一代年轻人,这种负面影响和正面压力会持续好几代人。

走出跌宕起伏的“战栗岁月”,欢欣鼓舞地迎来“科学的春天”。但传统的惯性势力裹挟着“赶超”思维,浮夸与浮躁成为农业科研领域流行的瘟疫,严谨、严密、严格的创造性科学研究竟演变成了虚张声势、竞赛评奖运动。

“口号农业”充斥报刊、“超级作物”满天飞舞；数不清的农业科研成果达到乃至超过世界水平。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基本上沉浸在激昂、亢奋、浮夸、跃进的氛围之中。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过去了 20 年，大多说体制改革已经完成，却少有人评说改革的成功与失败。蓦然回首，农业科研院所依然机构重叠，部门所有，人员众多，研究重复，特别是“官本位”和“等级制度”成为科研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难迈的“坎”。

我们这代人横亘在历史变革的拐点，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经历”。和作者同时代的农业科研人员，虽然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劫难，见证了激烈的无情斗争，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创痕，但出于种种顾虑，或报喜无忧，或乏善可陈，或刻意回避，在相当程度上仍隐身于阴霾之中，不愿揭示尘封在心底的痛苦记忆。其结果是，当真实的个性化记忆被普遍漠视遗忘时，人们（特别是后来的青年人）对那一时期农业科研历史的认识也就更难以接近原状。当作者退休后有时间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时，源于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鞭策与驱使，决定拿起笔来，揭开尘封，尽所能地修补我所经历的农业科学研究的实际面貌，为逝去的历史作证。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历史是一面镜子，本着“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的道理。回顾历史，反思挫折，汲取教训，启迪后人。这就是作者编写《逆向思辨——点击中国农业科学》一书的初衷。

中国农业科学呼唤自由评论；愿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力。

作者通讯处：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 高 7 楼 2203 室，邮编 100081

Email: tongpingya@263.net

目 录

历史让后人评说(代序)	(1)
第一章 农业科研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	(1)
一、无休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2)
二、“反右派”斗争重击知识分子	(6)
三、“文化大革命”再贬知识分子	(15)
四、迟到的知识分子的“春天”	(21)
第二章 遗患深远的对摩尔根遗传学批判	(26)
一、李森科“炮制”伪科学在苏联发难	(27)
二、两个“学派”在中国大地激烈碰撞	(30)
三、摩尔根遗传学家遭遇批判厄运	(34)
四、青岛遗传学会议“破冰通途”	(39)
五、政治干预科学遗患深远	(44)
第三章 农业“大跃进”考量农业科学家	(49)
一、毛泽东发动农业“大跃进”	(50)
二、科学家为放“卫星”推波助澜	(52)
三、高产“卫星”一波高过一波	(55)
四、放“卫星”考量农业科学家	(59)

五、农业“大跃进”遗患深远	(62)
第四章 农业科研机构“大起落”及其遗留弊端	(66)
一、按苏联模式组建农业科研体系	(67)
二、农业“大跃进”与科研机构大扩展	(69)
三、农业科研机构大精简和再恢复	(71)
四、“依靠七千五,还是依靠七亿五”	(72)
五、历史给科研机构留下的深层弊端	(76)
第五章 从科研人员“断层”到“人才跃进”	(79)
一、历史地看待科研人员“青黄不接”	(80)
二、硕士、博士“大跃进”	(82)
三、令人眼花缭乱的“人才工程”	(86)
四、新世纪兴起的“院士崇拜”	(89)
五、创造“人尽其才”的制度和环境	(92)
第六章 改进农业科研立项和成果评审制度	(96)
一、质疑课题立项可行性论证	(97)
二、剖析科研成果鉴定程序	(100)
三、正确认识科研成果的时效性	(102)
四、改进农业科研成果评审制度	(105)
第七章 剖析农业科技领域的“评奖运动”	(107)
一、剖析农业科技成果“评奖运动”	(108)
二、刹住“领衔、搭车”不正之风	(110)
三、科技成果评奖是一柄双刃剑	(111)
四、逐步取消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113)
第八章 农业科技论著署名权及其越位防范	(115)

一、农业科技著作署名过多	(116)
二、研究生论文署名越位	(119)
三、论著署名无序及越位成因	(122)
四、规范科技论著署名秩序	(124)
 第九章 技术职称评定制度及社会化改革方向	(127)
一、回顾技术职称评定的发展历程	(128)
二、量化指标评定职称凸显的弊端	(130)
三、废除“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132)
四、遏制职称与“官位”紧密相伴	(135)
五、改革技术职称评价体系及其方向	(137)
 第十章 农业科研院所办企业是进还是退	(141)
一、农业科研院所办企业遍地开花	(142)
二、科研型企业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144)
三、难以平衡的“一院(所)两体”	(145)
四、科研型企业是“进”还是“退”	(148)
 第十一章 基层研究所改革的路子怎么走	(151)
一、基层研究所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力量	(152)
二、基层研究所改革与生存现状	(154)
三、科研人员面对改革的困惑与忧虑	(156)
四、全面规划为基层研究所改革定位	(159)
 第十二章 评说农业科研要为农业生产服务	(161)
一、把农业科学定位为应用技术科学	(162)
二、“三十年河东”——样板田里出“经验”	(164)
三、“三十年河西”——实验室里出“理论”	(167)
四、农业科学研究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	(170)

第十三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174)
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历史变迁	(175)
二、市场经济深触农技推广功能之痒	(177)
三、“咸安模式”引发激烈反响和争论	(181)
四、百万农业技术推广大军何去何从	(183)
第十四章 把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提到改革日程上来	(188)
一、品种审定还是登记是一个敏感问题	(189)
二、品种审定制度暴露出的许多弊端	(191)
三、实行品种登记备案制度的可行性	(194)
四、坚定地稳步推进农作物品种登记制度	(196)
第十五章 遏制浮躁,还科研一片净土	(199)
一、浮躁,科研领域流行的瘟疫	(200)
二、新世纪“超级作物”满天飞	(203)
三、“跑部钱进”滋生权力腐败	(206)
四、遏制腐败,还科研一片净土	(210)
第十六章 官本位,科研体制改革难迈的坎	(214)
一、农业科研院所“衙门化”测试	(215)
二、沿袭政府部门的“等级制度”	(216)
三、“官本位”垄断科研资源	(218)
四、从体制根源革除“等级制度”弊端	(221)
第十七章 农业科研体制改革还没有真正破题	(224)
一、回顾农业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历程	(225)
二、各级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做法	(227)
三、科研院所徘徊于市场经济边缘	(229)

四、从源头推进农业科研体制改革	(234)
第十八章 中国农业科学呼唤自由评论	(238)
一、评论对农业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239)
二、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评论明显滞后	(241)
三、亟待发展的农业科学自由评论	(244)
四、创造自由活跃的评论氛围	(247)
后 记	(251)

第一章

农业科研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的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重点是“改造”。农业科研人员被意识形态运动裹挟着,尽可能地用各种贬义的辞语,自责、自辱自己的家庭、师长、出身乃至人格。“反右派”斗争埋葬了一部分科技精英,“文化大革命”把农业科研人员归类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遭遇的厄运是一场民族悲剧,对铸成这场历史悲剧负有责任的社会力量,无论是民族、国家、党派、群体乃至个人,都已经付出并仍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

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华民族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全中国人民包括漂泊海外的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激动振奋。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年代,是一个抵挡不住的充满诱惑的年代,也是牵动中国人复杂感情、经历独特命运的年代。

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绝大多数农业科技工作者、从海外回国的或准备回国的农业科学家,以及还正在农业院校读书的青年学生,都心潮澎湃地期盼着新中国的召唤和安排,愿意奉上拳拳赤子之心,为发展农业科研事业做出贡献。

一、无休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新中国接收下来的农业科研实力微不足道。据 1949 年统计,全国仅有 30 多家农业科研机构、470 多位中级以上科研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 年,有一批农业科学家从欧美回归祖国。那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和激情,放弃了在国外的富裕生活,满怀科学报国的理想,欢欣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干部共同浸沉在祖国新生的愉悦之中。虽然当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并不优裕,知识分子却能感受到春风般的和暖与温馨,全心全意地投入新中国建设。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农业科研人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从旧政权留下的农业科研人员;二是陆续从欧美选择回国的农业科学家;三是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农业科技人员;四是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一、四部分人员较多,旧政权留下的研究人员占比重大,人员组成也比较复杂。人民政府采取“包下来”、“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这项政策原本是一个整体,但在执行过程中被割裂开来,淡化了团结和教育,突出了“改造”。

正当农业科研人员为发展农业生产热忱地投入工作,却不知不觉被接

二连三的意识形态运动裹挟着,一步步地走向理性与现实的迷宫。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风运动等等,肃清反革命运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都少不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让知识分子作无休止的检讨。令农业科研人员迷惑不解的是,政治和科学研究有根本性的矛盾吗?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为什么遭遇如此的冷漠对待和粗暴批判呢?

农业科学技术界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关文件指出:对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思想改造,其目的是“肃清科学界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影响,批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能根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的要求来进行改革”,把“思想上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切实地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们知道,能进入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1]

195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对知识分子检查批判的方法和步骤:“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脑”和分层“过关”,即“1. 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2. 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3. 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4. 直到最后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

农业科学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用狭隘的阶级观点评价科研人员及其科学研究,否定在旧政权下科学工作者的全部历史和工作;确立“科学有阶级性”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帮办”,并用这样的观

点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科学技术人员。似乎在工人农民掌握政权和新中国建立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农业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工作者。有关方面在科学界发动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自然科学不是意识形态,没有政治含义。用政治标准去衡量、批判和要求本来不具备政治属性的事物,必然会使政治运动发生偏差并走向误区。

思想改造运动把对农业科研人员的“改造”从思想层面推进到政治层面,从个人检讨推进到群众帮助,从“向党交心”到会议批判。根据职位高低、声望大小、“错误”轻重,在规模不同的群众会议上公开地、反复地做自我检讨,接受群众批判,“洗”去身上污垢,最后由群众讨论决定是否“过关”。农业科研人员胆战心惊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诚恳地、全面地检讨自己,痛悔“原罪”,清除剥削阶级和封建家庭的影响,表示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思想改造运动的方式还比较温和,一般是在小组会上自我检讨,“典型”人物可能要在大会上作重点发言;后来运动逐步升温,思想改造方式也日趋激烈,相互之间要检举揭发、诋毁贬损,有些地方发展到人人过关乃至无情的粗暴的人身攻击。后人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概括为“人人洗脑,层层过关”。

“检讨”几乎成为农业科研人员的生活日程和行为方式:夜晚想检讨,白天写检讨,开会念检讨。通过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上诞生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农业科研人员的自我批判文稿,大多是从报刊杂志照抄内容雷同的伟人讲话或社论辞语,词组固定,言简意赅,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再加上各自的理解运用,或自我贬损,或批判他人。

翻阅那个年代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很多农业科学家的所谓“检讨”。随手捡拾《农业科学通讯》刊登的留学美国著名畜牧学家郑先生的一段文字,题名《我对资产阶级业务思想的批判》。

“我没有经受过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以致不能有无产阶级思想。在幼年时被封建社会旧道德观念所束缚、教育,使我学会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套处事之道,以致造成了我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与世无争的‘超政治’想法。以后又长时期接触资产阶级教育,对于外洋的‘物质文明’极度迷醉,贪图生活上的优越享受”。“我在留美五年中,接触了一些‘名儒

硕彦’，常常引以为荣，似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我浸醉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下也学会了这套皮毛，钻牛角尖，发表洋八股；我不但受了他们的影响，而且还觉得臭味相投，与他们同流合污。返国后，我就抄袭了全部美帝作风，想把自己造成与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样有地位的专家，有声望的学者，有权威的教授，因此创立实验室，进行钻牛角尖的研究工作，企图把自己的工作单位造成资本主义一般的很像样子的‘学术环境’”。“凡是这些钻牛角尖，标新立异，抢先成名，都是美帝国主义科学工作者所常常玩弄的把戏，我抄袭了这套恶劣作风，也常常引以为荣，还很得意”。^[2]

郑先生的“检讨文字”可谓当时知识分子“自责、自贬、自辱”的典型，可能很具有导向性，被作为“范文”公开发表。50多年后的今天检看起来，仍然让人感受到那颗沉闷的被压抑的心。

在绵延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暴力强制成分逐步加大。从完全自愿（如政治学习）到掺杂思想强制，再借助有组织的群众批判和相互揭发，最后被迫进行检讨。每次检讨都要联系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用各种贬义的辞语，自责、自辱自己的家庭、亲友、师长、出身乃至人格。“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让科学家、教授在广大群众高呼口号声中“洗脑”、“过关”，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感情。有些科研人员多次检讨不能通过，不少人痛哭流涕地说昧心话，违心之言成为检讨过关的唯一路径。也有个别“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科研家，被认为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连连遭受批判，他们没有选择“出卖良心”的自辱、自责、自贬方式，却以“自戕”以示“抗拒”，获得了一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真诚的忏悔向毫无实事求是之心的自贬自辱式的“认罪”演变，知识分子群体失去自豪、自信与自立的“资本”，沦为一无所有的“精神贫民”，其后果是此后在科学研究或农业生产以及科技政策上出现的偏差，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异议。在“自然科学有阶级性”观点主宰下，一些农业科研人员战战兢兢陷入了扑朔迷离的政治迷雾之中。

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当承认，在建国初期，即使是“左”的错误尚处在萌芽期，这项政策也不是成功的。尽管1949~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对外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连续不断

的政治运动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彻底否定了他们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也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和发展科学事业的社会环境。

二、“反右派”斗争重击知识分子

新中国刚刚成立,农业科研人员经历了始料不及的一次接一次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转瞬间沦为新社会重点“改造”的对象,他们心中搅拌在一起的酸甜苦辣滋味难以用言语表述。

相比之下,1956年初的社会政治环境却是农业科研人员久处阴霾难逢的“晴天”。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讨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加强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充分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前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是在数量上、业务水平上和政治觉悟上,都不足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对知识分子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能力的充分发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果说1956年是科学家久旱逢甘露的春天,那么,这个春天的气候也是由多种国际国内因素组合构成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发生的变化;以批判和纠正斯大林所犯错误为主题的新思潮、新理论被迅速地介绍到中国,打破了对苏联、苏联党、斯大林的崇拜和迷信,有助于被禁锢思想的解放;在国内,遭受历次政治运动连续打击的知识分子群体表达出的消极抵制,促使政府检讨和调整知识分子政策。1956年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妥善落实“六分之五”的工作时间,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并以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表示对他们的政治信任。